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阎浩岗 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海外
借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阎浩岗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阎浩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1-019435-6

I. ①茅… II. ①阎… III. ①茅盾(1896-1981)-小说研究②丁玲(1904-1986)-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4305 号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MAODUN DINGLING XIAOSHUO YANJIU

阎浩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9435-6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北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经费资助出版

自序

茅盾和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又各有其特殊性。重要在他们的创作成就和社会地位,特殊在他們是以自身实践诠释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的不可取代范例。

说重要,是因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领导地位。

茅盾是中国新文学奠基人之一,又是新中国文学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早年参与发起建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并革新《小说月报》,译介西方文学思潮。后又提倡“革命文学”,并于1927年以《蚀》三部曲垂范。1933年他的《子夜》出版,使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真正有了“现代”结构和史诗范式,有了真正大规模大气派的都市文学。《农村三部曲》又是最早剖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表现“丰灾”怪象的短篇佳作。“鲁郭茅”的文学史排序绝非个别人凭空随意而为。他是新中国首任作协(文协)主席和文化部长,新中国文学风云激荡,或荣或辱,无不直接关涉到茅盾。他的身后,“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最有影响、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项。丁玲则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者,1952年她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这是中国作家到那时为止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中国作协(文协)常务副主席、首任党组书记(时称党组书记),是作协的党内实际领导人。

论特殊,茅盾和丁玲是与20世纪中国政治、中国革命关系最密切的作家。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大革命时期代表中共参与国民党中宣部工作。1927年腥风血雨中他失去组织关系,乃借小说创作表达对革命的切身感受,并反思革命。后来他一直被视为左翼作家领军人物之一。1949年后

2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的各种文艺运动中,他一方面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一方面又在适当时机表达个人独立见解,并曾为此受到间接批判,文革前夕被接受辞去文化、文艺界领导职务。

丁玲“左转”之后,也是“左联”最活跃人物之一。1933年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成为震动全国的政治和文学事件。1936年她从南京逃出后,在陕北保安受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群体的热情欢迎。到延安后,她一方面作为文艺界领导人积极参与党的文艺活动,一方面又以自己受过五四洗礼的头脑思考解放区新问题,以女性的眼光发现阳光下的些许阴影。她的一组作品是引发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导火索之一。后来她在南京被监禁的一段经历成为缠绕她后半生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加上她与文艺界另一位主要领导人的纠葛,使其备受磨难,蒙冤二十余年。新时期复出后,她又以不同主流的姿态引发争议,访美言论出乎西方媒体预期。但她从不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文学选择和政治选择后悔。

因此,茅盾和丁玲都非常值得研究。他们的小说是他们文学生涯的主要结晶,也是观察他们精神世界的窗口。研究对象丰富复杂,笔者学力有限,只能选择特定角度切入。对茅盾,主要探讨其创作方法,因为茅盾毕生关注创作方法问题,他对之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有自己的独到探索。另外就是他的小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丁玲小说,同样绕不开她与“革命”的关系;但她又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女性。所以,丁玲的个性,特别是她的生命意识、身份意识,也是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早以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如今对作为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的土改运动与几十年来不同类型的土改叙事,学界争议颇多,本书也将抓住几个关键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别的学者们的高见新思,也通过对其研究成果的述和评,呈献给读者。

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	1
-----------	---

上编 茅盾小说研究

第一章 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	3
第二章 茅盾与沈从文创作方法之比较	19
第三章 中国社会剖析派的西方渊源	29
第四章 《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性	40
第五章 茅盾与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贫困叙事	45
第六章 茅盾与 20 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	57
附:茅盾小说研究概况(1928—2017)	67

下编 丁玲小说研究

第一章 丁玲:革命年代的个性话语	123
第二章 丁玲的个性主义与“革命”性格	131
第三章 丁玲小说的身份意识与生命意识	141
第四章 丁玲土改叙事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	155
第五章 丁玲土地革命书写的马鞍形轨迹	174
第六章 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	186

第七章 评近年出版的几部丁玲传记	200
附:丁玲小说研究概况(1929—2017)	224
后 记	272

上 编

茅盾小说研究

第一章 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非主流性

茅盾长期关注创作方法问题,并且写有多篇专论。他本人的创作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它和主流创作方法有何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这里所谓“主流创作方法”,是指1949—1976年间在中国大陆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为中国大陆作家所共同遵守的创作方法。茅盾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是公认的左翼作家的重要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掌管着共和国的文艺事业,与周扬、郭沫若、何其芳同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主要阐释者。因此,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茅盾本人的小说创作与主流创作方法是一致的,甚至认为茅盾是主流创作方法的奠基者、茅盾小说是主流创作方法的主要体现者。

然而,通过分析研究,笔者发现,茅盾小说的创作方法与后来的主流创作方法有诸多重大差异,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要了解茅盾小说创作方法的特点,弄清它和后来的主流创作方法的异同,以及它的美学渊源,非常必要。

人们产生茅盾是主流创作方法代表的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与新中国成立前非解放区的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相比,茅盾小说与主流创作方法的要求最为接近。它与主流创作方法确有诸多一致之处:它往往以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背景,在写人时突出其阶级性。《子夜》以后的作品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表述基本一致,特别是他创作《子夜》时从社会科学命题出发的做法,使得有些学者把他视为“主题先行论”的始作俑者。然而,笔者近年来经重新研读茅盾小说,发现它与主流创作方法有着明显区

别,而且他本人早期和后期的创作方法既有其一贯性,又有其差异性。

一、生命体验与社会剖析的融合

茅盾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主流创作方法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其创作宗旨或创作目的以求真为前提,包括真实地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客观地剖析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要求文学对社会人生发生一定作用。

许多人由于茅盾曾表示创作《子夜》是为表达自己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由于茅盾小说的题材往往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便把它当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典型。我以为这是一个误解,至少是对茅盾小说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入。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包括政治效果)与主流创作方法倡导的把文学当作宣传政治、政策的工具,这两者并不能画等号;作者的表白也不能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依据,这一是因作者的表白往往受特定社会形势的影响,受具体语境的制约,二是因作品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常常不一致。而且,茅盾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并不只是《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单凭它们并不能概括茅盾所有小说创作的特点。诚然,茅盾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子夜》及其以后的小说更是他进行社会剖析的典范作品。但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开端——《蚀》三部曲,却不是以社会剖析见长,而是以表现其生命体验为主的。即使是他后来的创作,虽然走向了自觉的社会剖析,但作为有良好文学修养与优秀艺术家素质的作家,茅盾并未放弃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与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探讨与追寻。他早年提倡的“为人生”,既有“为社会”的涵义,也有“为个体生命”的内蕴。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他曾说过:“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到我自己来试做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①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茅盾在理论文章中曾大力提倡过自然主义,试图为中国现代小说输入科学研究、精细真实描写的

^①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77页。

精神。而在创作其处女作《蚀》三部曲时,他却难以坚持冷静理性的科学研究态度,而倾力表现其人生体验了。在《虹》以后的创作中,茅盾小说注重社会剖析的特点日益明显而至定型,这时,左拉、巴尔扎克的科学研究或社会历史分析精神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探索人生意义的精神已经融为一体了。以前的研究者一般只注意到茅盾小说社会剖析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人生探索的一面,有人还以政治倾向为标准、以社会性和时代性为尺度,把茅盾前期的《蚀》及短篇小说看作不成熟乃至失败之作。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对之不敢苟同。

《蚀》与《子夜》是茅盾小说的两部重要代表作。关于《蚀》的创作宗旨或动机,茅盾的表述是“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①《子夜》的创作宗旨则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②因此,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面貌。然而,它们又有其一致性,即关注社会重大问题,重视文学作品的时代性,把人物放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上展示其性格与人生追求、个人命运。只是对于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探究各有侧重而已。

虽然茅盾在其处女作中即表现出对于时代与社会的密切关注,但《蚀》三部曲的创作宗旨与艺术效果却并非像他在后来的小说那样展现社会整体、剖析社会肌理。如果单纯以反映时代社会全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衡量这三部中篇,它们无疑都不十分令人满意。因而,较早时候的茅盾研究论著一般都对《蚀》采取有保留的肯定态度,比如说它“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胜利到失败后的部分历史面貌”,“写出了大革命时期的几个重要的侧面”,但没写足积极的一面、没写足正面人物,“未能全面地反映当时革命形势,并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向”。^③然而,文学是人学,评价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应当是对

①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77页。

②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页。

③ 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2页。

于人性揭示的深刻程度及艺术形象本身的生动真实程度和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大小,而不是其他什么标准。总之,虽然人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文学关注的中心应当是人而不是社会或历史。写社会和写历史目的还是为了写人。就写人而言,我以为《蚀》的艺术价值并不在《子夜》之下。

从茅盾有关的创作谈和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以反映社会全貌为艺术宗旨,而是致力于倾诉、表达自己在时代大潮中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价值追寻。现在看来,《蚀》及与之同时或稍后的一些短篇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革命的反思;(2)对女性解放的感受与探索;(3)对人生道路、人生意义的追寻。茅盾早期小说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并非简单明了。正如其笔名所示,茅盾本人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显示出来的内涵充满了矛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中,作者曾谈到“茅盾”这一笔名的由来并将他当时看到的种种矛盾概括为五个方面:(1)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2)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3)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4)他自己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5)其他人思想与言行上的矛盾。笔者以为,其中尤以第四个方面即作者本人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对其创作来说影响更为深刻、更为根本,是“渗透他整个灵魂的矛盾”。^①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于革命的态度上。1927年的政治事变之前,茅盾一直是社会革命的热衷者、参加者、推动者,因为受家庭影响,他少年时便已有改革社会的志向与抱负。至于改革社会是以渐进改良方式还是以暴力突变方式,他并无明确概念。与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一样,茅盾是出于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出于对个人灰色生活的难耐与对热情、激情、刺激的渴望而参加革命活动的。大革命高潮中与1927年政治事变后的局势动荡中的暴力与血腥,使多年来关注社会科学并喜欢理性思考的他不禁产生了困惑、彷徨与心灵上尖锐激烈的矛盾。许多学者指出了《蚀》当中对革命中和革命后阴暗面的描写过多,调子过于低沉,这实在是因作者本人感触最深的是这些阴暗面。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对三部曲构思的表述说的是当时革命青年心态的演变,也

^① 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4页。

是他本人心灵的真实写照。人们都说茅盾写小说时与其人物总有一定距离,在其作品中找不到作者本人的影子,但笔者以为,起码《蚀》中不尽如此。静女士的幻灭中有茅盾的幻灭,方罗兰的动摇中有茅盾的动摇,张曼青、王仲昭等人的追求虽非现实中茅盾的具体社会实践,却能印下他思想意识中上下求索的轨迹。

在《动摇》第十一章中,方罗兰一方面意识到土豪劣绅的党羽“时时找机会散播恐怖的空气”,认为应当镇压,另一方面当看到店东们被纠察队吓得面无人色时又产生同情。其中有一段方的内心独白:

正月来的账,要打总的算一算呢!你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掀动了人间的仇恨,现在正是自食其报呀!你们逼得人家走投无路,不得不下死劲来反抗你们,你忘记了困兽犹斗么?你们把土豪劣绅四个字造成了无数新的敌人;你们赶走了旧式的土豪,却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们要自由,结果仍得了专制。所谓更严厉的镇压,即使成功,亦不过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驾驭的另一方面的专制。

这段话由于用的是自由直接话语,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反革命派复仇的叫嚷声”,^①有人则认为这是方罗兰自己“良心上的呼声”。^②笔者以为,这段独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茅盾本人对革命二重性的反思,对革命暴力的矛盾心理。不能认为茅盾本人对于革命不虔诚,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只是他与许多同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是出于对黑暗腐朽的中国社会不满、迫切希望尽快彻底地改变现状这一动机而拥护革命的。他不像出身下层贫民或有过颠沛流离经历的作家那样对阶级压迫有那么切身的体验,因而,作为一个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善良知识分子,他对革命中和革命后的血腥行为感到触目惊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动摇》中,茅盾笔下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场闹剧,

① 黄侯兴:《茅盾——“人生派”的大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②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一场狂欢。特别是在初版中描写的“公妻”场面,那些被“公”的丫鬟、寡妇、土豪的小老婆,不是痛不欲生,而是“吃吃的”笑着,感到好奇、好玩;而对于残杀,“半个城是快意的”,除方罗兰夫妇外,孙舞阳等革命弄潮儿也并不感到特别痛心。似乎只有方罗兰在痛苦地目睹并反思着眼前的一切。

社会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矛盾。比如宗教,既有凝聚人心、整合社会,使人超越、使人高尚圣洁的一面,又有使人愚昧盲从的一面。革命可能在量变条件具备的前提下通过暴力手段完成质变,使社会发展出现飞跃,使社会利益得到一定平衡、社会结构实现新的稳定,但不可避免的流血也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加深、使人心变得坚硬。若单从生产力发展来看,许多暴力行为虽以恶的面目出现,却推进了历史;而若从人性本身的完善看,却未必尽然。也正因如此,才常有怀念以往民风“古朴”、叹息当今“人心不古”之论;也正因如此,西方人对“革命”一词并不像我们在20世纪的前八十年那样视为褒义词,它有时是中性的,有时则与战争、灾难等词并列;也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才反思“革命”,对“渐进”、“改良”、“改革”甚至“保守”等词予以重新认识。历史学家可以而且应当站在生产力发展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真正的文学家却不肯放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尺度。近十多年来,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已对历史上的暴力行为进行了反思、解构,而从《蚀》中我们可以看出,茅盾在亲历了革命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对革命、暴力与人道主义等问题便已有了深刻思考。他没有明确的结论。倘若他不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或倘若没有对革命负面影响的恐惧,他都不会在对革命幻灭之后产生如此强烈的心理矛盾。

另外,在《追求》中,作者对于革命幻灭之后青年人的其他出路进行了探索,比如教育救国,比如“半步主义”(渐进改良),比如办社团。特别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他在三部曲中以及短篇集《野蔷薇》、中篇《虹》中用大量笔墨予以展示,在《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中作为副线也有所表现。对于解放了的妇女,茅盾无疑是钦佩、敬慕的,这从他对慧女士、后期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以及梅女士的描绘上便可见出。但对这问题作者的态度仍有矛盾,他笔下那些放浪形骸的新女性如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以及《子夜》中的革命者蔡真、玛金等人并非堕落,相反,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或坚定的人生追求。然而,

在茅盾早期作品中,这些女性的命运多为悲剧性的。而对于那些困于封建家庭的青年女性如张婉卿,受过新思想影响却没能挣脱金钱羁绊的青年女性如林佩瑶,作者又感到惋惜、给予同情,对于幻想自己激进实则懦弱平庸的青年女性如张素素、胸无志向而游戏人生的青年女性如林佩珊,作者则予以嘲讽。茅盾对于女性的描写、对于妇女解放的思索及对解放了的妇女的态度是有其亲身体验作基础的,他在革命中曾与许多新式女青年打交道,后来在个人婚恋生活中也曾发生过动摇和困惑,在大上海的长期生活使他对现代都市女性也有直接感受。

茅盾的早期作品有极强的个人体验,却也不乏对社会的研究。对革命的反思、对妇女解放及对革命知识青年出路的探索都是他社会研究的课题。在《石碣》中,茅盾还揭示了革命者对政治权术的运用,剖析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派系及阶级出身问题。但早期小说中对社会的剖析并不占中心的主导的地位,更没有对社会结构整体进行剖析的明显意图。而在《子夜》以后的创作中,社会剖析就走向前台,作者关注的焦点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命运与出路转向国家民族的现状与出路。但这些社会剖析小说中的成功之作也并未放弃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它们仍以作者的个人体验和对其他个体生命的观察研究为基础。所以,不论是吴荪甫还是吴老太爷、林老板、老通宝,作者都能为之设身处地,将他们写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单纯的社会符号。众所周知,茅盾是一位非常善于进行细腻的心理描写的作家。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需要的正是感同身受的体验。

不单以表达生命体验为宗旨的早期小说,即使是《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社会剖析小说,在创作宗旨上与当时以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暴力革命为宗旨的“革命文学”或“普罗文学”,以及后来更明确、更单纯地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政治宣传功能的解放区文学、社会主义主流文学,亦判然有别。这类社会剖析小说虽在客观上有一定政治宣传效果,作者也试图通过作品说明自己的见解,但在笔者看来,《子夜》《春蚕》等作品的内涵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明晰。例如,夏志清从《春蚕》中看出了“人性尊严的赞美诗”。^①

①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